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
资料室

《清代人物传稿》序言

84 4 26

戴　逸

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。一切经济的、政治的、军事的、文化的活动，都是人所策划，人所参与，人所进行的，离开了人，就无所谓历史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神圣家族》一书中写道："'历史'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"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二卷，118—119页）。历史上的任何辉煌业绩都是由人类完成和创造的。每个个人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，因而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，对历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。当然，就单个个人而言，在多数场合下影响总是很微小的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而且个人的力量和作用，常常会相互抵消，被淹没在波涛汹涌的历史的汪洋大海之中。只有集中和代表着许多个人的意志和行动，亦即阶级的、集团的意志和行动才是强有力的，才能够在历史的戥盘中显示出份量。

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，要着重研究各个阶级、各个集团的利益、性格、意向、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，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。但我们一点也不抹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，因为杰出的个人正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，群众意志的体现者，群众行动的组织者。杰出的历史人物最善于体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群众的意愿，最能够反映本阶级的利益，把社会发展已经成熟了的任务，提到日程上来，并且能够动员和组织群众，为实现某个历史目标而努力奋斗。个人的行动可以在历史上发生巨大的作用，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。他的意志、才能、性格、作风、爱好都会影响具体事件的发生、发展，使得历史的进程打上个人品质的印记，而具有特殊的外貌。历史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，但这种必然性离不开个人因素的偶然性，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。如果不是许多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的活动，历史本身将不复存在，也就没有历史的必然性。马克思说："如果'偶然性'不起任何作用的话，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。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，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。但是，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"偶然性"的，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'偶然情况'."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四，393页）。

因此，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一个个人物进行具体的研究。过去的历史书籍，详细地记载了许多人物的思想和行动，以此作为主要内容。例如：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开创的"纪传体"史书就是这样。一部二十四史，绝大部分是人物的传记，其中保留有各个时期、各种人物的大量生动丰富的记录，这是我们的宝贵的历史遗产。应该说：研究历史人物个人的生活经历、言论行事和品格特征是历史学家的责任。

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编写了这部《清代人物传稿》，希望通过对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剖析，更深入地理解清代的历史。清代离开现在的时间很近，和现实息息相关。有清一代三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天翻地复，动荡剧烈，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时期。曾经创造了古代灿烂文明的封建的中国，越来越落后于西欧国家，终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

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，灾难深重，进行了激烈的反抗。中国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暴风雨中摸索前进。当然，清代的三百年，也有它的成就和业绩，经济上繁荣兴盛，达到了封建经济的高峰，政治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，思想文化上成果累累，创造辉煌。众多的人物活跃在清代历史的舞台上，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。这些人物，有的叱咤风云，顺应历史的潮流，不愧是站在时代前头的英雄；有的杀身成仁，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英勇献身；有的矢志革新，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为己任；有的以创造性的科学技术成果和思想文艺作品造福于人民；但也有的干了卑鄙龌龊的勾当，留下不光彩的名声，成为历史的小丑和民族的罪人。不了解一个时代众多的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，也就不会了解这个时代。记述和研究清代人物的经历、行事、思想、贡献以及他们的品德、才能、作风、爱好等，将给人以有益的启发和借鉴，将是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去透视有清一代的历史。

已有的清人传记很多，汗牛充栋，屈指难数。但今天仍有根据新观点、新体例重新进行编写的必要。现存的清人传记汇编，如，《清史稿》、《清史列传》、《国朝耆献类征》、《碑传集》正、续、补编、《八旗通志》、《清儒学案》、《满汉名臣传》等等都卷帙繁富。另外，文集、地方志、野史、笔记、家谱中还有很多传记、行状、轶事、墓志铭、神道碑等等。我们根据七十一种清人传记汇编作了粗略的计算，有传记可寻的清代人物有四万多人，这还是很不完全的统计，地方志和文集中的很多传记，尚未全部包括在内，实际数目还要大大超过。这样丰富浩瀚的清人传记资料是我们工作时必须认真采择、精心吸取的，不充分地利用这一巨大的宝藏，就不可能写成高质量的《清代人物传稿》。但是，已有的传记存在着不少缺点，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。我们要写的人物传，不是旧传记的选录、拚凑或简单改写，两者在指导思想、体例风格、评价标准、写作目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。对于过去的传记，我们应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，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批判地继承、利用。

已有的清人传记有如下一些重大的缺陷。第一，传记选录和评价人物的标准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，所以达官贵人、忠臣孝子、贞女节妇充斥于旧史传中，并被大加颂扬，中间很多人并不是重要的人物。第二，散见于文集、家谱中的大量传记，很多是"谀墓"之作，为了夸耀父祖或朋友的功德，竞立佳传，隐恶扬善，颂词盈篇，沽名钓誉，其真实性是可疑的。第三，许多传记形成刻板的写作公式，枯燥地记录传主的仕途经历、官职升转。千篇一律，千人一面，缺乏特色。较少对本人事业、言行作生动、具体的记述，更少对人物的精神面貌、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探索。第四，清人的传记虽很多，有一人而数传、十数传的。但很多却是辗转相袭，大同小异，改头换面，即成新传，内容重复、文字雷同。第五，真正在历史上起作用的许多重要人物，旧的史传中却记载很少，语焉不详。如农民起义的领袖，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人物，才能卓越的妇女，有贡献的科学家、技术家、发明家，以及华侨、实业家、工匠、民间艺人、医生、拳师、僧道喇嘛、宗教人士等等。今天，要为这些人编撰传记，深感资料缺少。

正因为已有的清人传记有上述缺陷，我们才组织了《清代人物传稿》的编写。所收人物的时间，起于努尔哈赤在东北兴起，迄于辛亥革命、清朝复亡。将网罗和记述这三百多年间比较重要的各方面人物，估计约有两千人左右，篇幅暂定二十卷。全书分为上、下两编，齐头并进，分别出版。

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。只有遵循这一科学的思想，历史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，我们才能够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去认识历史的本质，才能够正确地记述和评价各种历

史人物。我们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，坚持从实际出发，详细地占有材料，经过认真的研究，力求真实地、公正地反映历史人物。做到“求实”和“存真”。真实性是任何历史著作的灵魂，应该秉笔直书，言必有据，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。不能虚构夸大，随意剪裁取舍，或者用现代人的模型去想象、改铸、评价古人。这部传记，以记事为主，寓论于史，少发议论。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，不苛求，不溢美，不隐恶。历史人物都是环境的产物，要如实地反映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、行动、性格，使人理解为什么恰恰在这一时代，恰恰在这个阶级、阶层之中，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人物。

作为历史传记，在尊重真实的前提下，还要求生动优美。我国许多优秀的历史传记，本身又是文学作品，写得文采风流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栩栩如生。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无论如何，科学内容和优美形式的结合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

我们的水平有限，人力不足，缺乏经验，编写这样一部大型的人物传记必定会碰到很多困难。我们将努力以赴，团结一致，谨慎从事，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工协作。我们将邀请众多的、各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参加编写，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，才能够构筑、绘制这一漫长、丰富而绚丽多采的清代历史人物的画廊。目前，这一工作正在开始进行，《清代人物传稿》的上编和下编各写成了第一卷，分别由中华书局和辽宁出版社出版。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。我们期待专家和读者对本书进行批评、帮助，以利于我们总结经验，发扬成绩，纠正错误，继续前进，去努力完成今后很繁重的编写任务。

清代田土计量种种

——读书随录之一

郭松义

研究经济史，往往需要用些统计数字，这就牵涉到计量学的问题。在我国浩瀚的史籍中，保留了不少可供我们计算、使用的资料，但是经常因为计量方法或计量标准的不一致，给我们带来困难，稍一疏忽，甚至还会闹出笑话。近年来，我因为接触了一些有关清代经济史的资料，发现清代的计量方法和标准也很不统一，就以封建社会中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田土为例，除了朝廷颁定的规制以外，各地几乎都有自己的方法和标准，而这又与国家的田赋征收，土地租佃、典当、买卖等有直接的关系，故兹就所见，对清代的田土计量种种，略述于下。

大小不等的亩积

亩是封建国家规定的田土基本计量单位。《明史·食货志》载：“凡田以近郭为上地，迤远为中地、下地。五尺为步，步二百四十为亩，亩百为顷。”清朝沿用明制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，以“部铸弓尺颁行天下”①，“凡丈地，五尺为弓，二百四十弓为亩。”②每弓亦称一步。官颁步弓，主要是为了清核田土，征收赋税。但是，由于各地的土地肥瘠程度和传统习俗存在差异，部颁弓尺并不能完全统一贯彻。康熙初曾在山东、直隶等地做过地方官